

书评

《南洋文献叙录》校后记¹

《南洋文献叙录》即许云樵〈南洋文献叙录长编〉（载《南洋研究》第一卷，1959：1-170）及许云樵〈南洋文献叙录续编〉（载《东南亚研究》第一卷，1965：107-169）之合编。

王杨红*

（WANG Yang Hong）

承蒙《许云樵全集》编委会和廖文辉师兄的信重，晚学忝列本册（第八册）《南洋文献叙录》之“特聘编校员”，三生有幸。如今，《叙录》校对完毕，已有时日，窃意需赘数语，道明校对之来龙去脉、资料来源及观感等情事，故率尔操觚，权作此文。不佞鄙见，难云鸿论，然敝帚自珍，或亦可矣。

2014年1月20日上午，作为《许云樵全集》副主编的廖文辉师兄发来邮件，推荐我担任史料与史学部分《南洋文献叙录》的校对。正值博士一年级寒假，我回云南老家，在兄长工作的个旧市停留几日，忙于阅读《诸蕃志》英译本的导言、书评及相关资料，为一篇评介该书的课程论文作准备。前一晚午夜，读罢材料，我给廖师兄写信，告知已委托同级同门的留学生阮湧洵，将拷贝了一些资料的光盘带往大马；也说无法参加华研的学术会议，只好请他将《许云樵评传》越洋寄来。躺下休息后，望着窗外朦胧的夜色，我一边回味资料，思考论文，一边想象《评传》的内容，憧憬其高论，渐渐进入了梦乡。次日上午醒来查邮箱，廖师兄的上述推荐，即映入眼帘。他在邮件中说，校对时间为半年，希望我能协助，因为其中涉及的一些学术问题并非一般校对员所能应对，需专人才能处理。时隔近三年，我现今依然记得当时的心情：开心夹杂忐忑——两者都源于对许先生的极钦敬，及对学术本身的敬畏；又一思“专人”一词，则诚惶诚恐。24日，在写完课程论文，并进行“思想斗争”后，我谨慎而坚定地回复廖师兄：我非常乐意校对，一方面时间较为充裕，另一方面（更重要的）我也可以借此扩充、加深对中外关系史、华侨华人史、东南亚史古籍的认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《叙录》条目远远不局限于古籍（详见《叙录》1959年引言）。

我虽已同意校对，但心中仍不免惴惴不安。盖对于《叙录》，我已有耳闻，知其篇幅甚长，为文献提要之类的基础性工具书，校对乃巨大机遇与空前挑战并存，并非易

¹ 原稿经已刊载于郑良树主编《许云樵全集（8）》（吉隆坡：马来西亚创价学会，2016年10月），页535-543，现有细微改动，“又及”部分为原稿所无。

* 王杨红 中国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世界史专业博士研究生。电邮位址：ganen87@126.com

事。好在返校后，以增改评介《诸蕃志》英译本之文为契机，在以前积累的基础上，我又增加了对若干中外关系史/华侨华人史/东南亚史古籍、中外著作及相关大家、前辈、学者的些许了解，感觉可以尝试开始校对了。如此，至4月26日深夜，我联系廖师兄，请他抽空将《叙录》原稿与排版稿寄来。两天后（28日），执行编辑邱君豪兄开始与我通邮，协调传送文本之事。至5月27日，君豪兄分三次，给我传来《全集》史料与史学部分之史学史、史料、序跋、会议实录各文及《叙录》（均为PDF文件，繁体字原稿为图片扫描件，简体字排版稿则可用繁体字检索）。考虑到《叙录》作为工具书的重要性，且其文本是单份篇幅最大者，校对恐需耗时不少，我决定先从它“下手”。然大致一扫，我即发现许先生原稿有细微错误，遂于9月3日晚向君豪兄建议，若版面及条件允许，《叙录》恐需加若干更正性质（本质上仍属“校对”范畴）的注释；他转达廖师兄之意，答复皆以“编按”处理。

这样一来，我可以毫无顾虑地“开工”了。至11月中旬，我从其他事情里抽身出来，真正开始一心校对。按之前提议，我增加了若干更正、补充性质的“编按”。实际校对起来，我发现《叙录》信息量很大，以至我的工作量也大。为便于校对及加按语，我在电脑上同时打开原稿和排版稿，各调至屏幕二分之一大小，原稿在上，排版稿在下（两份文件皆为横排，便于阅览，若为竖排，则应分占左右二分之一，调小文字，才能上下通览，校对多有不便），同时另建WORD文档，将其中表格分为条目、页码、排版、校对、编按五列：“页码”为排版稿页码；“排版”为排版稿不符原稿或不恰当之处；“校对”即对应的改正内容；“编按”为我所加按语。如此，原稿、排版稿与校对（含编按）可“精准对接”。找出排版稿相比原稿的错误，在“校对”栏还原、改正之，为一校；找出原稿错误，提要及引文出处，或增加原稿所无之提要，在“编按”栏纠正、复原、完善、补充之，为二校；综合检查以上二校，统一格式，为三校。这三校有先后，亦有穿插，一、二、三校校毕，即为通篇校讫（四校即补校见下文）。

事实上，排版稿和原稿的错误皆不少，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，也增加了我的校对量。《叙录》总计1484条，我全身心奋战一月，仅校对了近一半，后不得不再推迟校对截止日期。排版稿之错误或不当，除对某些字的更改，如“菲律宾”、“斐律滨”径改为“菲律宾”，“栢城”径改为“檳城”，“新嘉坡”多改为“新加坡”等及其他错别字，与许先生原稿或（和）条目所列原著不相符，需还原、更正外，尚有条目排序、格式、标点、数字、字体、字号等，亦即尊重原稿前提下的统一文本问题。条目排序（实际是汉字排序）方面，校对1—500条时，我没有像校后文尤其867—1244、1245—1484条时那么重视，待通篇校讫，再来改动、标示、统一此前校对中的排序，已比较困难，故只能发邮件向廖师兄及君豪兄说明，请编委会留意，如菲在斐之前，菲律宾在菲律宾之前，栢在檳之前等等（其余条目，君豪兄也有所变更）。至于格式，如出版信息“平装/精装本”与页数之间的空格，《长编》先出、有，《续编》晚出、无，经与君豪兄协商，一律改为无。标点一项，原稿一般在某书篇目之间用逗号，排版稿大多改为分号，需改回或协商调整；又如，排版稿书名号（《》或〈〉）之间，一律未用标点（逗号或顿号）隔开，为求前后统一，我向廖师兄建议引言、凡

例也如此处理；再如，作者所属国籍或朝代，排版稿混用括号（）与方括号〔〕，后与君豪兄协商，国籍均用括号（），朝代则用方括号〔〕，以示区别。至于数字，原稿有时写汉字，有时写阿拉伯数字，校对时，凡是可改为阿拉伯数字的，我一律改动。字体、字号等，是排版本身的问题，我亦在校对时标明。

原稿之误，或内容，或人名、地名，或时间，间有误植、衍字及遗字等。有的极细微错误，我需搜检若干资料后才能确定（不似上述排版稿错误，逐一细细对照原本，即不难发现），试举数例言之。原稿条目，如“南行记”条提及马建忠为“期颐臬马相伯之弟”，我发觉前三字不通，不解何意，后一查，方知“臬”实应为“叟”，“期颐叟”乃马相伯百岁自署。又如“皇輿考”条云，朱璉为江西“新涂县”人，曾“巡监”长芦，此地名、职名我亦存疑（长芦为盐场），后翻检所引原著具体内容，方知分别为新淦县（即今新干县）、巡盐。当然，上述两例也可能源自手民之误植（后者实出自许先生引王重民《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》原文，因我未见王书，乃直接查其所引原著而发现两错，故无法确定两错是许先生原稿之错，还是王书之错）。再如“南洋华侨与经济之现势”条（张荫桐译述），第一篇署名“田村寿原著”，许先生径直说“田村寿原所著”，然查日文原著，方知作者为“田村寿”，而非“田村寿原”（作者名与“原著”二字相连而无空格断开，确易造成误导）。对上述错误，我常常“忍不住”加按语。原稿有的条目，许先生只列书名、作者，无出版信息（或出版信息极简）和相应提要，对此我亦视资料获取情形而酌加按语。许先生独自一人编此巨著之时（1929—1965年，前一时间据1959年引言首段“阅三十寒暑”而来，后一时间则为《叙录续编》问世时间），局势不定，颠沛辗转，诸多资料无法核查，提要工作实为不易，若干错误、缺失实难避免。现今其所提著述多可找到，编辑、校对时，若发现错误，宜指出，方不致再贻误世人；若发现遗漏，当量力增补之，以便读者利用。

与此同时，我也据上述考量，校对时即反复确定按语的真实性和准确性，并在校讫后规整了按语的文本格式。如某书被列入某一文库或丛书，对这一文库（如新中学文库），我起初并未加书名号，后觉得有必要加上，所以一律查阅加上（即对应改为《新中学文库》）；再如朝代与作者之间，我此前有时用如“清·邓凯”（即两者之间加一点），有时则用“〔清〕邓凯”，后一律改为“〔清〕邓凯”。

随着校对的推进，我对相关问题（含格式等）的认识，似不断深化。所以，除校讫初定之5份WORD文档，分别记录1—500、501—866、867—1244、1245—1484条及引言一凡例之外，我又陆续建冠名“改动处”的文档，说明校对及编按修改、完善之处，前后共建25份（分别为8、8、6、3份，引言一凡例无），其中编按栏不乏数次修订者。如此，君豪兄需同时参看30份文档，方能确保前后一致。而对书名号和相关引号的使用，我曾斟酌很久：说某人著有某书，那书名需要加书名号，殆无疑义，如“许云樵著有《南洋史》一书”，但说某人著有某书，其书名为什么什么，那这书名是否要加书名号呢？反复考虑后，我认为没有必要加，因前已明确指出后所引文字是书名，而非书籍本身，所以我改用引号而非书名号，亦即在编按栏，我如此说明：此书书名实为“菲利滨独立战史”。类似句子，在“编按”栏较多。我也写信与廖师兄商讨，并请其留意，考虑我的建议，之后再定夺。

在编委会尤其廖师兄、君豪兄的全力支持下（包括将原定由我校对的史学史、史料、序跋、会议实录各文转交他人负责），校对截止日期，虽为不得不，亦为得以一再“顺延”：先由最初所定2014年11月底，延至12月15日，后至2015年1月底，又至3月初，再至4月初，最终4月24日深夜初步通篇一、二、三校校讫；29日核查若干纸本完毕后，次日晨我将含《改动处》的校对文稿一并发给了廖师兄；之后又于12月、2016年1月两次致信君豪兄，请其增改有关条目；2016年4—8月，在收到他传来的订正版（即改正排版稿错误，增加编按的新版本）后，我又先后与他互通邮件27封，对正文、编按进行增改（四校）。从2014年11月中旬启校，至2015年4月底通校讫，再至2016年8月中旬（大致）补校毕，前后陆续耗时共计一年零九月，其中集中校对半年，零散一年零三个月。学海无涯，校对亦然！

《叙录》条目皆为中文著述（含译作），提要兼及部分其他语种文献。有赖于全球化时代的开放，网络化时代的便捷，及厦门大学所拥有的较为雄厚的软硬条件，通过搜寻读秀中文学术搜索（<http://www.duxiu.com/>）、中国国家（数字）图书馆、中国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（Chinese Academic Digital Associative Library, CADAL）、香港大学图书馆，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，日本国会图书馆、早稻田大学图书馆，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图书馆及谷歌等网站，运用厦大所购数据库和馆藏，我已可阅读其中所列除教科书之外约80%的书籍，或可查询其出版信息。如此充分、丰富的研究、检索条件，许先生若在世，也会惊叹吧！不过同时，他可能也会提醒：网络之于学人，作用似双刃剑，便利且朦胧，既如此，若时机允许，当一头扎入故纸堆，拂书海之厚尘，绝蠹鱼之饱饲（“饱饲蠹鱼”一词出自《叙录》1965年引言），盖傅斯年先生所云“上穷碧落下黄泉，动手动脚找东西”，不会也不可能随时过境迁而易辙矣。

念及此，时至今日，我依然惶恐莫名。虽然校对时我所查书籍，恐怕不下2000种，数量不少，然比起许先生的孤军奋战、焚膏继晷数十载，算是非常轻松了[《叙录》排版稿为386页，订正本（最初）为529页，仅增加37%篇幅（即编按12万字）]，但我自认自始至终以如履薄冰的态度，逐字对照、改订，加编按，并在初次通校及随后修订时反复检查、核实，竭力确保无误。即使如此，以我一人之力，校对这一基于客观事实的史料评介专著，错误恐在所难免。我本欲在初次通校后，再对订正版进行一次完整校对（含校对我所加“编按”），无奈学业之事异常紧张，实在无法抽身，所以只好偶然翻阅时增改（即2015年12月—2016年8月我发给君豪兄的修改意见）。君豪兄来信说8月中旬定稿，我心中忐忑不已，不过却也能对许先生及编委会无奈而坚定地说：后学如我，已尽力了！

实话说，2014年11月中旬全心开始校对后不久，我即意识到所需查实文献数量之庞大，及文本本身（主要是文字、格式）校对之繁琐。当时开工20天，我只校对了不到50条（平均每天不到3条），因此各种心情夹杂。我曾想“私自”挑选其中以安南、越、老、寮、柬、缅、暹、泰、马、砂、婆（罗洲）、新、星、印、荷属、苏（门答腊）、菲、中、南洋、东南亚、华侨、华人等开头条目，加以校对，毕竟这样可以减少一些（或一部分）工作量，但这种想法产生之后，瞬间被埋头校对的气氛、行为所

淹没。这好比次年初参加厦门国际马拉松赛跑完42.195公里全程回来的朋友所说，只跑了几公里就想放弃，但这种念头迅速被奔跑的人潮所淹没一样。若真采取“挑选式”校对，那我的工作量确实可以减轻，但我也将辜负编委会及廖师兄，乃至辜负许先生的信任、期望，待日后《全集》问世，诒骗读者，罪莫大焉。回顾当时的想法，我庆幸自己坚持下来了。这次校对，是一次提升检索能力，扩展史料积累和学术视野的难得机会，让我得以增加对我所深深钦佩、推崇的民国相关学者的认识、了解，并兼及其著述搜集。所有这些，对我日后的研讨均有根基性的意义。我徜徉于书海之中，痛并快乐着。乐此不疲？然也，或在各种思绪交杂中然也。犹记大学本科我选修了一门目录学课程，老师讲到校对时说，古人称其为“校讎”，讎者，仇也，即要把错误当仇人一样找出来。我那时不解其意，现在校对完成，总算明白些许了。

校对过程中，有一个问题偶尔萦绕在我的脑海，即许先生是否同意后人给他的著作尤其《叙录》一类工具书加编按——若赞同，则我所加按语或有所值；若不赞同，则按语将“名不正言不顺”。不过我心中仍偏向认定他赞同一侧。待正文校毕，方另校引言（两篇）及凡例，读至其1959年引言次段“夫叙录文献，有赖博洽，孤陋如余，抑且多舛，倥偬急就，断难周详。今以长篇付手民，私心所期，抛砖引玉，冀通人不吝郢政，并希收藏家慨予借阅，出版者惠赐一读，假以时日，修补增订，则椎轮之始，或冀有成”，及1959/1965年凡例末条“本篇所收图籍，间有不获偶目者，故仅举其名，博达如能赐示其详，俾得补订，实所幸祷！其他疏误，亦望不吝教之”，此乃许先生希望后人修订之明示，末学遂顿感清爽矣。学无止境，思维开阔，谦虚谨慎，客观公正，理性平和，采百家之长，切磋交流，乃至为文论辩，阐幽发微，进而相互进益，共襄学林，然也。

至于今人编前人文集，鄙见以为，战战兢兢之余，不失真恐应作为其第一原则；在此原则之下，若遇原稿极为明显的错字，可径改之，否则应一仍其旧，不作修改（可另加编按说明）。这一原则实际可分为两方面：其一，相对于原稿，排版稿不失真，即排版稿须忠于原稿；其二，相对于原稿内容所提及的信息（出版信息、引文、史料、史实及某些事实性的评介），原稿内容不失真，即原稿内容须忠于其所提及的信息。两者都只论，且只能论是非，无其他评论余地。而许先生乃大家，其著述领域广，涉及历史、考古、语言、文化、民俗、文学、政治、经济、中医、新闻传播等学科；文体多，囊括论、考、译、著、编、注、散文、诗歌、童话、行纪、消息等文；资料语种杂，兼采中、日、泰、巫、梵、英、法、荷、葡等东西文。今人编其《全集》（若深究，纯粹的“全”集并不存在），更应抱万二分战战兢兢态度，以不失真原则为本，方能前符许先生之期，中合学界之望，后应时间之验。大浪淘沙存真金，晚生如我，诚冀本已是真金的“全集”，历经风霜雨雪，终能成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的真《全集》，而非“藏诸名山”之“学说”（见1965年引言）而已。

不知不觉，于中国大陆教师节之夜，走笔至此，南普陀寺浑厚的暮钟已敲过，而厦大王亚南经济研究院（WISE）暑假课室的灯光却依然通明，不佞心中也充满感激：非常感谢廖文辉师兄的大胆推荐与编委会的完全信任，我得以“特聘编校员”身份参与《许云樵全集》编校具体事宜，期间之感谢、收获、感受又怎是只言片语可以道尽！

也很感谢执行编辑邱君豪兄耐心的协助与敬业的支持，我得以心无旁骛完成校对。更应感谢者，是许先生及我所知其他大家、前辈、先进，他们坚韧的治学精神、崇高的学术成就与淡雅的生活艺术，值得我永远学习、回味。当然，最终问世版（尤其编按）之错误，我作为编校者，难辞其咎，敬请学界大贤、方家不吝金玉，赐教一二，至为感谢！

日本泰国研究前辈石井米雄先生晚年所撰回忆录，主标题为“道路将启”（道は、ひらける）。他研究泰国史半个世纪，影响及于日本国内外，举世公认，尚云路将启，何况后学如吾等？敢问路在何方，路在脚下，且闻之，且思之，且悟之，且省之，且行之。以此与学界同仁共勉，并向许先生明志。是为记。

2016年9月10日于厦大经济楼初稿

9月11日于厦大凌云山舍二稿

9月27日于南宁旅次三稿

10月2日于厦大凌云四稿

又及：

12月23日晚，君豪兄突然发来本册书影，告知《叙录》已出版。因近日正思忖对校后记稍作增改，以作定稿，故看到封面时，我惶恐之至，当即询问校后记如何处理，并自答道：定稿未出，则四稿为“定稿”可矣。他复传来印就之上述四稿，我心微安，然当在此再赘数语：

在“编按”中，我尝试尽量还原许先生叙录评介之出处。不过，还原其中所引史料较易，而追溯许先生评介语之源（即评介语最初的出处）甚难，实际回溯者仅为一小部分（后者属于史源学的范畴）。而“编按”所引后人成果，大部分止于初校（前三校）完成之2015年5月，少数至四校校讫之2016年8月，且以民国时期（1912—1949）和中国大陆成果（含译作）为主，兼及台港澳及国外部分著述；至于所引版本，其截止时间与上同，故两者均有遗漏。新版本缺漏者，如：（1）《大越史记全书》标点校勘本，孙晓主编，牛军凯、翟金明副主编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（重庆）、人民出版社（北京）2015年12月共同推出，繁体横排，4册，75万字；（2）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资料室藏力钧所撰《槟榔屿志略》，聂德宁点校整理，收入陈可冀主编《清代御医力钧文集》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（北京）2016年8月出版发行。与此同时，《叙录》所提二十四史及《清史稿》，目前似以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为最善，此为世人所共知，故我并未在“编按”中将其列出。另外，《叙录》排版稿共1484条，删除明显重复条目后的问世版仅1469条，特此说明。

2016年12月26日补记

2017年2月26日改定